

秉 信



阿拉木圖學生暴亂與民族問題

去（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蘇聯「塔斯社」發佈新聞說，十七日晚與十八日共和國的首都（哈薩克共和國的首都）街上鬧事，反對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全會的決議。「流氓、寄生蟲及反社會分子」乘機對法律與秩序的代表施以非法行動。他們放火焚燒一家食品商店和一些私人車輛，並騷擾市民。暴亂發生後，黨政當局立刻採取「堅決措施」以恢復阿拉木圖市的秩序，在十八日當天，一切已恢復正常。

阿拉木圖學生示威的主要原因是，撤換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十二月十六日，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全會選舉一名俄羅斯人科爾賓（G. Kolbin）為該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以取代原任庫納耶夫（D. Kunaev）。庫納耶夫是哈薩克人，任此職已達二十一年；從一九七一年起，兼任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按照往例，他失去哈薩克共黨第一書記職務後，其中央政治局委員職位亦將不保。這一決議公佈後，阿拉木圖馬上發生學生暴亂。

蘇共當局打破傳統，於暴亂發生後，立即向國內外報導此一事件。[蘇共現任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後，一貫主張，凡事皆可報導，沒有問題不可討論。在這一暴亂事件中，表現得相當具體。這一次學生示威反映出不少問題。]

第一，民族矛盾：按照蘇聯官方報導，這次暴亂是由「民族主義分子」唆使而發生的。以往，蘇共各加盟共和國與自治區的共黨首腦皆由當地主要民族擔任。此次，以俄羅斯人取代哈薩克人為第一書記，引起了暴亂事件。因此，本質上這是民族矛盾的表現。事實上，哈薩克共和國的俄羅斯人佔境內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點八，哈薩克人祇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九。按理，兩族輪流擔任共黨第一把交椅本無不可。但是，在這兩個民族之間並無真正的「兄弟友誼」，才輕易引發民族矛盾暴動事件。

第二，反對改革：從另一方面看，庫納耶夫是布里茲涅夫的老部下，在位二十多年，哈薩克黨政機構幾乎都是他的親信。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願進行改革，因循守舊。據判斷，這次事件的幕後主使者可能就是一些已失去職位或將失職位的人，他們就是「塔斯社」所說的反社會分子與寄生蟲。

第三，宗教問題：哈薩克人是信奉回教的民族。近年來，蘇聯中亞地區，回教意識增強。共黨喉舌說，該地區宗教情況很複雜，反宗教的無神教育不能令人滿意。回教復興必然強化民族意識，也使民族問題更加難以處理。據一九八六年的一次調查，中亞大學生中百分之四十二承認是回教徒；百分之三十八，認為回教無害。

顯然，哈薩克學生暴動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問題。蘇聯為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始終存在。近年來，民族主義日熾，固然由於宗教與政治權力問題而起，但也由於俄羅斯人的「沙文主義」。俄羅斯人覺得，蘇聯多年來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他們的功績，因此表現出自大傲慢，而觸發民族意識上升。針對這次事件，蘇共《真理報》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一篇社論，題為《在統一的蘇維埃家庭中》，曾對這種傾向嚴加批評。不過，要消除俄羅斯沙文主義，同消除民族主義與地域主義一樣困難。

蘇共釋放沙哈洛夫

去年十二月底，蘇聯著名科學家與人權運動領袖沙哈洛夫（A. Sakharov）已獲得蘇聯政府的寬釋，在服了長達七年流刑後回到莫斯科。在回到莫斯科前，戈巴契夫曾親自打電話告訴他，他們夫婦可以返回莫斯科，恢復他的「愛國工作」。

沙哈洛夫生於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大學畢業，一九五三年被封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對發展蘇聯彈性有功，被譽稱為「氫彈之父」。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他倡導人權與裁軍，不見容於蘇共當局。一九七五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七九年，蘇聯軍隊侵佔阿富汗；一九八〇年初，沙哈洛夫予以嚴厲批評，觸怒當局，遭「國安會」（KGB）逮捕，取銷了他的科學院院士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等一切榮譽，將他放逐到高爾基市。

沙哈洛夫被捕後，西方國家反應強烈，並曾發起援救運動，但蘇共置之不理。一九八五年初，戈巴契夫繼任蘇共總書記後，厲行經濟改造，並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民主化，主張凡事公開（glasnost），有限開放言論。在這個背景下，他毅然開釋沙哈洛夫。具體言之，蘇聯開釋沙哈洛夫至少有下列三個原因。第一，國際輿論。他已成為世界人權運動的偶像，若不釋放沙哈洛夫，蘇聯將繼續成為世界輿論及世界人權運動抨擊與指責的對象。第二，過去數年內，蘇聯國內情況已有變化。國內反體制勢力已經被鎮壓，活動已降低，對蘇共政權不再構成威脅。第三，改善蘇聯國際形象，促進對外科學關係。沙哈洛夫被放逐後，不僅國際形象遭到嚴重損害，同時也成為其與外國科學關係的障礙。

沙哈洛夫回到莫斯科後，已接受過幾次外國記者的訪問。他表示，今後他無意成為蘇聯反體制的領袖。他已年老力衰，祇能為開釋幾位尚在獄中的朋友盡一些力。他將以其餘生獻身於科學研究，從事物理學核子理論研究。他表示支持蘇聯現在的改革和已在實施中的新聞開放政策。

戈巴契夫向全蘇人民發表新年賀辭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於一九八六年最後幾分鐘對全體蘇聯人民宣讀新年祝辭。他說，已過去的一年是蘇共「二十七大」年，因為「二十七大」在蘇聯歷史中定下了基礎。戈巴契夫說，不久之前，「改造」祇是一些構想與計劃，現在已顯現出真實的輪廓。去年也是為和平加緊努力的一年；人們已更深刻瞭解戰爭災難的危險性與改善國際關係的重要性。

他宣稱，在經濟各部門內去年已克服停滯現象，取得實質的成長，國民所得的成長超過百分之四；在未來一年中，蘇共要爭取更高的水平、實施新的經營方法、堅決改善產品品質。戈巴契夫指出，蘇聯在各個領域內所面臨的任務將更加重要與更加複雜，因此必須人人加緊工作。這樣，在「十

月革命」的第七十週年內，才可獲得好的勞動成果。戈巴契夫警告說，蘇聯已步入轉折之途，這是大家的選擇。現在，仍有一些阻礙與溫情力量，希望返回舊軌上去。但是，這些力量不會阻止蘇聯的改造。他特別提出，主動與責任、批評與公開、民主與紀律乃是蘇聯的政治與道德立場，也是發展社會主義體系的有效手段。

在國際問題上，他說，核子對抗形勢要求世人採取新的立場。蘇聯曾提出廣泛建議，以改善國際氣氛。但這些建議已在冰島會議上遭到失敗。不過，他表示，蘇聯仍願與其他國家合作與談判，以便完全停止核子試爆、裁減或完全銷毀核子武器、在平等與共同安全的原則上發展國際關係。同時，戈巴契夫提醒西方世界，蘇聯對和平的愛好，並非軟弱的表現，因為「蘇聯武裝力量擁有一切的必要裝備、捍衛著社會主義的成果」。

以上是戈巴契夫新年賀辭的要點，可以顯示出他在未來一年內的內政與外交的主要方向。一般觀察家認為，一九八七年是戈巴契夫改革政策的關鍵年。他在去年，曾公佈多項改革方案，旨在縮小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但在實施這些改革時，他的能力面臨嚴重考驗。從他的講辭中，可以看出，反對改革的勢力並不小；也可以看出他有決心貫徹這些改革。

在外交上的成敗，尤其在對美國關係上，必然影響戈巴契夫改革政策的推行。因此，在一九八七年元旦的《真理報》上，他回答美國記者說，蘇聯人願與美國和平相處，不願與其為敵，並願與美國繼續談判。

阿富汗停戰與蘇外長來訪

元月一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即阿富汗共產黨）舉行臨時擴大中央全會，總書記納吉布拉以「人民民主黨在實行全國和解政策中的任務」為題提出報告。他宣佈，從元月十五日起全國停戰，為期六個月；並成立「民族和解最高非常委員會」，由知名人士、回教教士、黨政組織代表

、中立及反對勢力代表等組成。元月四日，該「非常委員會」舉行會議。會中，納吉布拉發表聲明，呼籲一切武裝力量和作戰的各方面全面停火，進行民族和解。阿共政府將吸引各種不同政治力量參加政府，使其具有聯合政府性質，阻止外來干涉，促成蘇聯早日撤軍。

元月五日，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蘇共中央書記兼國際部部長杜布萊寧（A. F. Dobrinin）突然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進行「工作訪問」。訪問過程中，他們曾與阿富汗首腦納吉布拉、部長會議主席克希特蒙德、外交部長華基爾等會晤；七日離去。他們曾討論了現階段雙方關係的實際問題。

據元月八日《真理報》所載《阿富汗訪問》新聞公報說，蘇聯方面高度評價阿共擴大中央全會的決議，完全支持阿富汗領導的政治方針。蘇聯願意給予建設性的合作，以促成阿富汗政治解決協議的擬訂與實行；莫斯科方面也希望，捲入阿富汗國內鬭爭的各個勢力以及干涉阿富汗的外來勢力認真而現實地對待阿富汗停火建議，利用這個機會解決與阿富汗人民切身相關的問題。蘇聯方面說，誰不這樣做，就要對阿富汗人民繼續流血和災難負責。

在一次宴會上，納吉布拉表示，他與阿富汗人民由衷地感謝蘇聯軍人、國際主義者給阿富汗人民的援助。現在，阿富汗正進入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開始了「民族和解」的過程。納吉布拉在宣佈「全面停戰」的二十天前曾訪問莫斯科，在宣佈停火之際蘇聯外長及蘇共書記隨即來訪，可見這次「停火」與「全國和解」完全是克里姆林宮的主謀。

莫斯科在阿富汗展開和談的主要原因是，長期戰爭未能解決問題，反抗軍力量有增無減。在以往七年中，蘇軍最多時達十二萬之多，死傷逾四萬

人，但師老無功，不得不改變戰略。至目前為止，反抗軍領導並未響應停火，因此「全國和解」在短期內很難成為事實，但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分化阿富汗反抗力量。同時，這個停火和解政策正好配合蘇聯全球和平攻勢。目前，阿富汗問題主要關鍵是「蘇聯立即全部撤軍」。蘇聯為了維持阿富汗現存政權，其撤軍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有關國家終止對反抗軍的援助並保證以後不再恢復這種援助。西方若干評論家往往把當今的阿富汗戰爭與以往的越戰相比。這種比擬也許可以自我安慰，但不合事實。至少有一點不同，蘇聯不會像美國一樣，從阿富汗「光榮」撤軍，任其傀儡政權滅亡。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訪問芬蘭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西方慣稱「總理」）瑞日可夫（N. I. Ryzhov）應芬蘭總統科維

斯托（M. Koyvisto）之邀於元月六至九日在芬蘭進行訪問。在此期間，瑞日可夫曾與芬蘭總統及總理會晤，並進行談判。戈巴契夫任蘇共領袖後，芬蘭總統科維斯特曾於一九八五年九月訪問莫斯科。此次瑞日可夫訪芬，其妻隨行，乃仿戈巴契夫作風。這是瑞日可夫一九八五年任部長會議以來首次訪問西方國家。

在芬蘭期間，他與芬國領袖們廣泛討論雙邊關係與國際關係，特別是發展兩國貿易與經濟關係問題。雙方締結了和平研究與利用太空協定、核子事故通報協定及交換核子設施情報協定。兩國有意進一步發展經貿關係，特別是注意經濟合作的新形式，因而檢討了建立聯合企業的可能性。蘇聯與芬蘭已協議，成立一個聯營企業，在莫斯科建造旅館及負責其爾後的經營。雙方未來經濟關係的主要方向，在彼此領土上聯合建設工業或其他項目，雙方也同意，在第三國進行聯合工程項目。

在國際問題上，雙方意見幾乎完全相同。他們共同認為，在核子太空時代，現實情況要求各國以新的態度去解決國際問題，也就是，拒絕使用軍事力量或以使用軍事力量威脅，而以政治手段解決一切問題。蘇聯與芬蘭領袖對歐洲局勢進行了廣泛的檢討。他們表示，決心促使全歐過程進一步發展，使其成為加強歐洲安全、安定與合作的巨大因素。雙方強調芬蘭所提出的使北歐成為無核區的建議；對於此點，蘇聯深表支持。

芬蘭為蘇聯北方小國，人口不足五百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與芬蘭兩度發生戰爭；芬蘭雖然頑強抵抗，但終遭敗績。戰後於一九四八年，雙方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一九五五年，蘇聯歸還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附近波卡拉（Porkala），雙方關係漸獲改善。芬蘭在國內政、經體系上與蘇聯截然不同，但在外交上緊隨蘇聯之後。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籌備工作上，出力尤多。近年來，蘇聯與芬蘭關係依然相當密切；芬蘭成為瑞日可夫第一出訪的西方國家，其意義非同小可。

蘇聯發表關於中東問題的聲明

未來的一年內，蘇聯對中東的關切與活動均將加強。

蘇聯外交部「聲明」（《真理報》一月八日）特別提起聯合國大會四一四三D決議案。該決議案不僅強調，必須立即召開有關中東問題的國際和平會議；而且通過，在安全理事會內成立籌備委員會，所有常任理事國皆得參加籌備委員會，以便共同採取措施籌開此項國際會議。蘇聯認為，這是集體努力解決中東問題的第一步。事實上，這個籌備會的召開也是蘇聯提議的。因此，蘇聯外交部發表聲明，敦促籌備委員會立即展開召集中東國際會議的工作。蘇聯特別表明，對會議的籌備工作，蘇聯不會作出任何預先的規則，一切由委員會集體籌劃。

元月八日的「蘇聯政府聲明」（《真理報》一月九日）是針對兩伊戰爭而發表的。莫斯科首先表示，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使兩國兩敗俱傷

，嚴重阻礙兩國社會與經濟發展。蘇聯指出，在這場歷時六年多的戰爭中，真正獲利者是「帝國主義」。因為，在這種自相殘殺的情況下，「新殖民主義」可在中東恢復其地位。蘇聯進一步說，「帝國主義」利用兩伊衝突，加強在波斯灣地區的軍事駐留，並為干涉他國內政找到藉口。蘇聯指責說，美國在兩伊戰爭中火上加油；在「蘇聯威脅」名義下，進行政治欺詐與幕後軍火交易。實際上，在這些行為之後隱藏著「美國新全球主義圖謀」，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該地區的人民。蘇聯政府聲明說，蘇聯始終主張儘快地終止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武裝衝突，不在戰場上而在政治談判桌上解決兩國之間的爭議問題。儘速調解兩國衝突，不僅符合伊拉克與伊朗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該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

莫斯科表示，在和平解決兩伊衝突上，蘇聯將積極活動，因為這是蘇聯對外原則性方針的組成部分。蘇聯向伊拉克與伊朗同時呼籲，希望他們儘快終止這個悲劇階段，重建友好與和平關係。

從一九八六年夏季起，蘇聯已明顯地加強在中東的外交努力，企圖解決以阿衝突與兩伊戰爭。同時，蘇聯與以色列於去年八月間在芬蘭首都舉行了十九年以來的首次談判。近年來，在中東問題上美國不容蘇聯參與。如今，美國在中東面臨尷尬局面，蘇聯亟想乘機而入。關於前述中東和平國際會議，雖獲大多數國家支持，但美國並不贊同。美國認為，這樣做徒使中東問題複雜化，最有效的途徑是，應由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進行直接談判。

蘇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科技、軍事、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

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一號帳戶